

《农政全书》编辑思想浅析

吴 平

(华中农业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编辑思想是书稿在出版过程中呈现出的相对稳定并贯穿始终的编辑观念。《农政全书》的编辑思想集中体现在发展农业为国家富强之本;突出农政,主张荒政;重视农技,编著详实;杂采众家,兼出独见;有章有法,图文并茂诸方面。

关键词 《农政全书》;编辑思想;农政;荒政

中图分类号:G 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7)01-0001-07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7.01.001

徐光启,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生于上海,我国明代末年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也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字子先,号玄扈,谥文定。其一生“负经济才,有志用世”^[1]。20岁考取秀才,36岁中举人,43岁成进士,后入翰林院,先后任翰林院检讨、内书房教习、翰林院纂修、左春坊赞善、少詹事、河南道监察御史等职。68岁时任礼部左侍郎,1632年(崇祯五年)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并参机要,1633年(崇祯六年)在其任上去世。徐光启作为有志于用世的古代读书人,乐于结交西方传教士,接受新的科学知识,通过撰写书籍、翻译书籍,亲身参加农业试验,提供朝廷解决民怨的对策等实现经以致用的抱负。他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虽然“及柄用,年已老”^[1]甚为可惜,但他在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农学乃至军事等领域都取得了诸多重要成就,若用现代的语言来称赞的话,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跨学科科学家^①。

徐光启学问虽杂,殊途归本于“农”。他用算学之法治水治田,以天文历学适时农务,以强兵治赋、治赋明农将农业与国防关联,在屯田、水利方面的理论总结与实务探究更是为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编撰了许多与农业相关的著作,如《农遗杂疏》、《屯盐疏》、《种棉花法》、《甘薯疏》、《种竹图说》、《北耕录》、《宜垦令》、《农辑》等,特别是被称之为“农业百科全书”的《农政全书》的编撰与出版,既有他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实践后总结出的有价值的经验,又有前人典籍的广泛搜集与分类辑录,无论种植养殖,抑或围田屯垦,有图有文,有章有法,普及推广价值明显,文化积累意义卓然。

多年来,研究者围绕着《农政全书》的作者与版本、农政思想、农业科学技术等方面展开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近年来,又有学者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书中所蕴含的农业生态哲学思想^[2];探讨了成书之社会环境^[3];从编辑出版学的角度作了《明清科技图书编撰出版研究》^[4]、《中国古代农书编辑实践研究》^[5]等博士毕业论文;研究者认为该书编辑思想即农政思想,是古代农书编辑史上集大成之作^[6]。现有对徐光启思想研究的专著与论文,多集中在中西文化交流和科技思想方面,富有代表性的如农业思想、数学思想、军事思想、天文历法思想、宗教思想等^[7]。但从编辑思想的角度研究《农政全书》者尚未发现。

收稿日期:2016-11-01

作者简介:吴平(1962-),女,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研究方向:编辑学、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等。

① 徐光启较早师从传教士利玛窦等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是介绍、吸收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他会同当时的中西历法,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奠定了我国近三百年历法的基础,取得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等数学著作,系统引入了欧洲的数学知识,促进近代数学在中国的发展。在军事学方面,他文武兼能,既带兵保卫国防,也制造火器,成功击退后金的进攻,且著述颇丰,《徐氏庖言》、《兵事或问》、《选练百字括》、《选练条格》等多部兵书纷纷问世。

书籍编辑思想是书稿在出版过程中呈现出的相对稳定并贯穿始终的编辑观念,是编辑意识的集中表达,是出版过程中编辑行为的最好诠释。编辑思想并非来无影去无踪、摸不着抓不住的幻觉,而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书籍编辑、传播过程中,是编辑理念与书籍内容、结构以及外在形式的有机结合。

研究《农政全书》的编辑思想,可以从二条途径着手:

一是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初稿,它是陈子龙筹备印制出版之前的版本。在初稿中,既有徐氏在农业和水利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译述,将农本、荒政、治水、屯田等系列农本思想凝聚于笔端,汇卷成帙;也有他收录、考证众多前代有关农业文献后,对古代文献及有代表性的观点所作的引伸阐发,如书上的文字注释、“玄扈先生曰”等内容,都可成为考证其思想产生、发展、成熟的重要论据。徐光启为《农政全书》构思与编著的过程就是一种编辑活动。这种活动需要明确的标准用于文献选辑,更需要鲜明的编辑思想引领标准。

第二条途径即是经陈子龙编辑付刻后的《农政全书》版本。约在 1630 年(崇祯三年)冬,徐氏于京邸向陈子龙提及此书,但未及付梓即去世。徐氏死后二年,“子龙于公次孙尔爵得农书而录焉”^[1]。崇祯十一年冬,陈子龙过录的原稿得到大中丞张国维、郡大夫方岳贡赞许与支持,崇祯十二年《农政全书》正式刊行。它成为研究《农政全书》编辑思想的另一重要途径。

因徐光启病逝,《农政全书》初稿未能得到亲自审定,但在陈子龙等人的帮助下,从拟定书名到撰写凡例^①,从次第安排到内容审定,著书宗旨贯穿于编辑行为,徐氏思想与子龙诠释得到完美结合。印制出版后,书籍影响不断扩大,视农田水利为国家之本业,重农史经典为朝廷资政,农政思想与农业科技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共鸣,更加彰显了原稿主旨,凸显了编辑思想,成为农书出版史上特有的辉煌篇章。

比较二条途径,后者作为正式出版物更符合编辑思想研究对象的要求,所指的编辑含徐光启、陈子龙二人。拙文即以此为基础展开。

概括《农政全书》的内容主旨,归纳其编辑特色,分析该书结构、特点等,总结其编辑思想主要在以下方面。

一、发展农业为国家富强之本

徐光启高度重视农业,这一思想在他的诸部书籍中都有阐述,其中“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治兵”^[8]堪称经典之语。在《农政全书》中亦有农业“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不勤五谷,宜其贫也益甚”^[1]之类的表述,言语文字不同,思想表达恒一,大抵都是如果不重视、不勤勉于农事,国家不会强大,百姓不会富裕,且将越来越穷。陈子龙十分理解并赞同徐光启发展农业之理想,在初稿基础上通过系列编辑活动更加强了这一思想。

《农政全书》的“凡例”看似是对每一门类如何布局、如何安排的文字说明,但许多布局、安排的出发点即是“富国必以本业”思想的诠释,这一思想十分深入且多处可见。如:“夫金银钱币,所以衡财也,而不可为财。方今之患,在于日求金钱,而不勤五谷,宜其贫也益甚。此不识本末之故也。二列祖宗,明农知依,著于功令者煌煌;而莫详述于冯慕冈先生《重农考》,故全载之”^[1]。这一段文字用于说明《农政全书》卷三将冯慕冈(冯应京)《经世实用编》中的《国朝重农考》全文载入。《国朝重农考》是徐光启极为赞赏的著作,将它收入《农政全书》除赞赏外,也还有支持、传播的思想。但该句的亮点却是前面几句看似铺垫的话,它批评了朝廷不勤五谷,分析了希望增强国力却不重视农业,使之陷入困境的原因。该书多处借明朝历代皇帝的农业政策和措施告诫当朝皇帝和官吏应重视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者。这是表达主旨的编辑思想在“凡例”中的体现。

也正是在发展农业为国家富强之本的编辑思想指导下,徐光启、陈子龙将《农本》置于全书之首。《农本》共三卷,除卷三为《国朝重农考》之外,卷一为《经史典故》、《诸家杂论上》,通过引经据典如《管

^① 有观点认为“凡例”为徐光启所作。本文从“凡例”最后两段不称“玄扈先生”而称“徐文定公”,推论是陈子龙所补。

子》、《庄子》、《史记》、《汜胜之书》等书,阐明农业于民于国之重要性。如引用了《管子》“一农不耕,民有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寒者”、“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之经典语句,用以说明农业与民生、与仪礼、与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关系。该卷反复阐述“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力能胜贫,谨能胜祸”、“勤力可以不贫,谨身可以避祸”,均在讲道理、说经典中劝告百姓“织而衣之,为开其资财之道”,告之官府,若百姓“腹饥不得食,体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亦安得以有民?”^[9]。此卷还引用了班固的《白虎通德论》:“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用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10]它解释了神农氏名称的由来,意在说明神农用天时地利,教民农作,惠予百姓等卓越功绩。

卷二《诸家杂论下》开篇讲述了明嘉靖阎宏为王祯《农桑通诀》一书作序之事,说到山东巡抚右副都御史安州邵公,在看到王祯《农书》时称赞说“大关民事,而政之首也”,立即转布政使司刻印。这“大关民事,而政之首”是邵氏之感悟,同时也是阎宏、布政使司同僚对农业及农书的肯定,与“富国必以本业”思想如出一辙。《诸家杂论下》也通过引诸子百家之语证明以农为重、古已有之的道理。如引贾思勰《齐民要术·叙》曰:“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田,万国作义。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9],陈述了《齐民要术》的主要内容,特别将“敬授民时”、“食为政首”、“万国作义”与农业联系起来,重点阐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思想,此乃“富国必以本业”另一表述方式,编辑思想统一,体系一脉相承。

徐光启号玄扈,原指一种与农时季节有关的灰色雀类,古时曾将管理农业生产的官称为九扈。徐光启自号“玄扈先生”,意在重视农业生产,催促民众及时耕种。他认为“不耕之民,易与为非,难以为善”。而国家要想安抚民怨,必须重视农业。徐光启去世后,陈子龙将他的书稿“呈大中丞张公,公以为经国之书也”,马上拿给郡大夫方公看,“公亦大喜,共谋梓之”。民以食为天这是千百年不变的道理,作为朝廷大臣有辅世之责,二位编辑可谓尽心尽力矣。

《农政全书》流传于世产生了持久影响,徐光启的儿子徐驥、孙子尔默等交口称赞。作为编辑之一的陈子龙在修补“凡例”时也作了高度的评价。“忠亮匪躬之节,开物成务之姿,海内具瞻久矣”。“开物成务”语出《易经》,《易·系辞上》:“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孔颖达疏:“言易能开通万物之志,成就天下之务”^[11]。“志”为道理,“务”为事功。即赞该书及该书编辑明理开通万物之事,成就百姓万物之理。徐氏生平所学,博究天人,且皆致以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因其关系到百姓生活之源,国家富强之本,故亲掌耒耜农具,亲尝草木之味,多方搜集资料,缀而成书。

二、突出农政,主张荒政

中国历朝历代,上至官府,下至平民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据《中国农学书录》记载,中国古代农书共有500多种,流传至今的有300多种。早如先秦时代就有不少的图书记有农事,书目中《汉书·艺文志》最先设置“农家”门类,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有农书篇章,元代官修的《农桑辑要》和王祯私人所撰的《农书》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这些书多以农本观念为中心,重点在农业生产技术和知识,是纯技术性的农书。《农政全书》相较于前代农书最大之不同,即着眼于“农政”二字上。不仅书名点“农政”之睛,更因其治国治民并重而傲立于其他农书。农政为全书之纲,技术为纲领实现之保证。

《农政全书》著书之际正值明末清初社会动荡、国困民穷之时,百姓对生活的不满、不安威胁着朝廷的生存,眼见明朝统治江河日下,徐光启作为政府幕僚者,屡次陈说朝廷,主张根本之计在于农,说明灾荒是引起百姓不安的重要因素,为了巩固明王朝、稳定百姓,应特别重视荒政。这一编辑思想贯穿于书中,直接影响了12目(门类)60卷的布局,最终呈现的书籍版本为: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

《农政全书·凡例》始云:“古之圣人,畴不重农政哉?垂于诗书者,彰彰也。然其文烦,其旨约。

故经典之言,著其尤要者,以明所始”^[1]。大意是历代圣人无不重视农政,古代文献典籍里有许多表述足以证明他们确实是重视农政的,然而文字过于繁杂,要义也表达不明。故经典之言,是找到其要义并简洁明确地反映出来。“凡例”是表现编辑思想的文献导言。其对古代文献的评价标准十分清晰,自己编书时自会予以特别注意。《农政全书》原稿为徐光启撰写,付印前陈子龙作了修改与增补,“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但无论原稿还是付印后的刻本,编辑思想均是统一的。多年来,有人依据《题农辑》、《先文定公集引》,认为书名是徐光启所取;有人从万历四十七年徐光启函复焦蛇谈及的《种艺书》、崇祯三年冬徐光启会见陈子龙提及的《农书》等事例中考证,认为书名是陈氏所定。但无论哪种观点都不影响付梓定型且广为传播的“农政全书”四字。从点题的“农政”来看,编辑的确做到了“著其尤要者,以明所始”。二字取意朝廷政务、地方政令,既辑录了大量前代和当时的文献,也记载了编辑的心得与见解,书名即是编辑思想直接的反映。

集中体现农政编辑思想的还有所设的“荒政”一目,它在《农政全书》中篇幅最多,其重视程度及地位张显性不言而喻。虽然《汜胜之书》与《齐民要术》间或亦会论及一、二种备荒作物,甚至元代王桢《农书》中的“百谷谱”还专门辟有“备荒论”,但篇幅及程度都不足以比拟《农政全书》,“备荒论”不足 2 000 字与“荒政”18 卷不可比,“农本”为卷之首、“荒政”作书之尾,此结构安排也充分体现了编辑之匠心。

关于“备荒”和“救荒”等荒政,集中在卷四十三至卷四十五,即“荒政”中的“总论”及“备荒考”上、中、下。徐光启的荒政思想体现在“预弥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1]十二字中。所谓“预弥”,即“浚河筑堤,宽民力,祛民害也”。“有备者,尚蓄积,禁奢侈,设常平”。这里说的“常平”,即政府修建的粮库,稻谷便宜时高价收入,谷贵时低价卖出,这是政府采取的利农、便民之举。“赈济者,给米煮糜,计户而救之”,也不失为一种救民之方法,但徐光启认为若考虑不细致,缺乏耐心与周全,仅能解决一时之饥,而非长远之计,百姓生活不会因此有多大改变,故而是“荒政”之下策。

为了百姓不再遭受水害,“荒政”一目中还收入了明朝诏令,介绍了前贤方法,条目详实,可操作性强,也体现了重视民命的编辑思想。

“水利”目共 9 卷,卷次上仅次于“荒政”。然而,水利之重要性并不逊于荒政。“水利者,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1]。“救荒”于朝廷是治标,“水利”于农业发展、于百姓生活是治本。明朝末年土地广袤,但因西北地区弃之未用多成荒地;战争频仍,京师和军队需要的大量粮食只能由长江下游启运,既耗时费力,又浪费惊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徐光启提出北方屯垦的设想,既可解决南粮北调的困难,又可巩固国防,安定百姓。解决屯垦离不开水利,屯垦需要发展水利,这也正是《农政全书》专门讨论开垦和水利问题的缘由,也是该书明确“谋国者,其举而措之”^[1]之主张的内涵。突出农政、重视荒政的编辑思想得到明确地指引。

三、重视农技,编著详实

实行农政离不开农业技术,农业技术是农政推行的支撑力量。除“农政”外,重视农业技术、务实的方法与精神也是《农政全书》重要的编辑思想之一。

徐光启不仅提供朝廷重视农政、实施荒政的政策与策略,而且亲自参加农业生产试验,积极推广试验成果,既直接帮助百姓务农,也丰富了古农书的内容。虽然说徐光启的政治生活“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1],但科学技术上的成就、特别是农业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在《农政全书》中却十分突出。

如关于棉花^①栽培技术,古农书中唐代韩鄂的《四时纂要》、元代官方司农司的《农桑辑要》与王桢的《农书》都有过记载,但多数百字而已;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的“棉谱”已较前代丰富,约 2 000 字,但随着棉花种植的普及、推广,研究者多了起来,研究内容也更加丰富,《农政全书》中 6 000 多字的篇幅,涉及棉花的种植制度、土壤耕作和丰产措施等。徐光启根据当时见到的史料,结合他访问、观察的

① 棉花在《农政全书》中沿用了元代以前“木棉”之称呼,见“卷三十五·蚕桑广类”。

经历,总结了棉花进入中国的历史。在辨别美洲木棉(西贝)、草本棉花和木本棉花时,推测“吉贝之名,独昉于《南史》……意是海外方言也”^[12],事实证明他的推测是正确的。《农政全书》十分细致地总结了棉花的生长特性,如“棉花密种者有四害:苗长不作蓓蕾,花开不作子,一也。开花结子,雨后鬱烝,一时堕落,二也。行根浅近,不能风与旱,三也。结子暗蛀,四也”;“总种棉不熟之故,有四病:一、秕,二、密,三、瘠,四、芜。秕者,种不实;密者,苗不孤;瘠者,粪不多;芜者,锄不数”^[12]。书中有不同时期的农书关于棉花生产的记载,经验丰富,著述详实,乃集棉花栽培知识之大成。如在记叙锄棉是一项细密之活时说到:“昔有人傭力锄者,密埋钱于苗根。锄者贪觅钱,深细爬梳,棉则大熟”^[12]。甚觉有趣,书中还系统介绍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栽培的经验,总结了“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12]之丰产要点。

徐光启热衷于作物试验。如积极推广甘薯种植方法,将本来在福建沿海一带种植的甘薯成功引进了中原。同时认为北方可窖藏薯种,甘薯种植应该比南方更易成功,且在试验的基础上完成了《甘薯疏》,既备荒灾之需,又推广了农业生产技术,令后人推崇。《甘薯疏序》记载:“每闻他方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正是他重视农业技术的真实写照。这一点在书中也有详细的反映。卷三十六“蚕桑广类·麻”记载:“苧性畏寒,不宜北土;北方地气所绝,无如之何。然紵衣沤紵,即又北方自古有之。宜试种为得”^[13]。即徐光启认可“苧性畏寒”的事实,但“北方自古有之”却似乎与之产生矛盾,务实地态度帮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即“试种为得”。

徐光启曾在天津尝试兴修水利,三年中大获其利,后因有人阻止而停止,但亲自试验的经历丰富了农事、水利方面的经验,增强了《农政全书》的应用性、操作性与可靠性。卷十二为西北水利,取材于元代著名水利家郭守敬从事的水利工作。此后至十六卷分别取材于各时期水利家,如战国末期的郑国、魏襄王时的史起、秦昭王时的李冰、西汉时的召信臣等等,以他们的功绩说明水利事业的重要性、水利工程规划及施工技术。如引王祯《农书》的水利图谱,并参照了他本人笔记中的《泰西水法》。

《农政全书》诸多章节均体现了对农业科学技术的重视。《管子·四时》曰:“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路”^[14],意为国家不了解四时,将失掉立国之根本,不了解五谷生长之规律,将要败亡。因而,设《授时》与《占候》二篇,说明必需根据时令合理安排农业生产,由专人执掌天文历算之学的重要性。关于粮、油、纤维也都有详尽地栽种、加工方法等的记载。特别统计、分析了水旱虫灾、救灾措施及利弊,如蝗灾的发生规律和治蝗方法等,最后附草木野菜可资充饥的植物414种。书中还论述了作物与风土的关系,强调人力可以使过去认为不适宜种植的作物得到推广,破除了作物适宜某地种植与否决定于风土的“唯风土论”认识,发展了中国古代农学的风土论思想。

四、杂采众家,兼出独见

《农政全书》杂采众家而成。它有选择地辑录了古代文献229种,但并非完全照抄不动,而是按照既定的编辑标准,或增删或修改,为“我”所用。开篇“农本”,下分“经史典故”与“诸家杂论”,两者内容即可得见“农家者流”。书中引《艺文志》:“农九家百四十一篇。农家者流,盖出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15],用以说明农官著书,播种粮食,劝农耕田种桑,丰衣足食。又引《礼·王制》篇:“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15],以说明国家应坚持发展农业,广积粮,以国富民强实力抵御水旱水灾。

杂采众家也体现了发展农业,增强国力的编辑思想。如引《管子》篇:“民无所游食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15],意为“人们不四处游食就会务农,务农就要耕田种地,种田则粮食多,粮食多则国家富强”。书中记载“管仲相齐,与俗同好恶。其称曰:‘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5]之文,实为赞成任齐国之相的管仲的“农本”思想:只有当人们衣食无忧时,方能明礼节,知荣辱。

杂采众家其实就是引他书证己意。如卷一、卷二部分地引用了俞贞木、黄省会、冯应京、李时珍之

书内容。“国朝为种艺之书者,俞贞木、黄省会之属也”^[1]。俞贞木,明洪武时人,著有《种树书》。黄省会,嘉靖十一年举人,著有《蚕经》、《种鱼经》、《稻品》、《种芋法》等书,这些书均在《农政全书》中被引。“外若冯应京《月令广义》虽纪岁时,李时珍《本草纲目》虽为医药,而取材甚博,故多采择焉”^[1]。《月令广义》是记叙每年十二个月的时令及事物之书,《本草纲目》是著名的药学专著。《农政全书》取其内容广博、影响广泛而将部分内容收入书中。诸如此类,卷五“田制”以王祯《农书》中的《奇器图谱一·田制门》为主要材料;卷六和卷七“营制”取自《齐民要术》与王祯《农书·农桑通诀》各篇;卷八收有诸葛昇《垦田十议》,及汪应蛟、沈一贯、耿橘三人的建议,可见编辑之功。

杂采众家体现编辑学识之功,兼出独见亦是编辑才华的集中展示。在采集他人他书部分内容时,徐光启也将本人的作品编入该书。据康成懿《农政全书征引文献探原》统计,这一部分篇幅约 61 400 字。如他担忧西北荒芜之地不被利用,专著《井田考》,用数学知识考证古代土地制度,催促百姓及早耕种,全文编入《农政全书》卷四。同理,卷九采用他自己的《垦田疏》,既体现著古制以明今用的特色,也展示了其在鲜明的农本、荒政意识下组织材料表达主旨的编辑思想。

兼出独见是对过去文献著录或流传经验的不遽信、不迷信、不盲从。《农政全书》敢于怀疑甚至否定史上著称农书的部分内容。如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总结了我国六世纪以前的农业成就,全书十卷九十二篇,是我国最早的农书,也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农业科学著作,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农政全书》卷二十八“蔓菁”条,“贾氏言:种宜七月初;六月种者,虫食。余家七月种者,甚苦虫;惟六月种者根株稍大,虫不能伤耳。”^[16]意思是《齐民要术》中认为蔓菁宜七月初种,六月、七月末种都不行。徐光启亲自试验后认为七月种者苦虫害,六月种者则免,其结论与《齐民要术》适反。尽管贾氏所说或许是黄河下游的情况,徐光启所记录的或许是长江下游的经验,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但此例可作《农政全书》不盲从旧说之证。

五、有章有法,图文并茂

从《农政全书》结构安排来看,布局谋篇,有章有法,事例记载,有图有文。

全书共设置十二目,农本为先,次列田制、农事,再列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每目名称均为二字,简洁上口,意义明确。如“荒政”,意即荒灾必引百姓不安,百姓不安必影响朝政。为此,朝廷应重视备荒、赈济。故“荒政”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充分体现了“预弥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的救灾方针。

各“目”依内容再细分若干卷次。如“田制”目下分“玄扈先生井田考”、“田制篇”二卷。此“目”所设即是为了合理利用土地,因地制宜,富国增产。故历代农业政策和田亩制度构成本卷次的主要内容,并撰写了《井田考》,介绍了王祯《农书》部分内容及各地农民利用土地的经验。

一目数卷,谁先谁后,组织排列先后顺序也有讲究。以卷三十七至卷四十“种植”目为例,先列种法(卷三十七),再排木部(卷三十八)、杂种上(卷三十九)、杂种下(卷四十)。这种排序法参考了周时九种职业中的二、三种排列的。《周礼·天官冢宰·太宰》曰“以九职任万民”,“九职”即九种职业,“一曰三农,生九穀;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17],其第二、第三种职业“或勤树艺之功,或收自然之利,百姓之所给也,工师之所化也,器用物采之所自出也”,因而载入。

《农政全书》除文字外还附有数幅图画。如卷十七、卷十八《水利图谱》用“图”的形式说明“因势制器,各极巧焉”,将“不可以言详”之部分恰当地呈现给读者。卷十九、卷二十引用了“有裨于农者”的《泰西水法》。这是徐光启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之书。水法内容本属机械学的范围,因前卷曾引王祯的水利图谱而联带及此书。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四引用王祯的《农器图谱》,“稍删其繁”,目的是“使览之者,惕然稼穡之艰难焉”。但对于所谓“北拙南巧”,“古繁今简”之说,“未敢妄增,以俟博雅”^[18-19]。

从编撰方法而言,《农政全书》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摘编,并加了许多评语。主要编辑之一的徐光启将自己在农业和水利方面的科研成果和译述也分别编入有关卷次中。因

编辑过程中偶有所得即记之,条理性稍逊,故该详解之处过于简略,有重复之处未能删减。陈子龙曾邀谢廷祯、张密以及徐光启诸位孙子等人一起对该书进行修补,但鉴于评点处多为徐光启观点,臆改不合适故多保全了下来,使后人可一览其概貌。

当然,研究《农政全书》的编辑思想也有让人遗憾之不足。比如,陈子龙后期固然想准确地保留徐光启的思想原貌,但无奈徐氏未及定稿即去世,书中不免若干贻误;再如,陈氏对徐光启原著的理解程度决定着他的编辑行为,刀删斧凿,难免偏颇,甚至带来新的问题。又如编辑思想有继承有发展,但思想并非如时间一般清晰明确,难决先后,谁继承谁发展,继承了什么发展了什么,都将成为后续研究的内容。

参 考 文 献

- [1] 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凡例[M].中国台北: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
- [2] 陈晓利,王子彦.论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的农业生态哲学思想[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2(5):88-92.
- [3] 陈宏喜.浅议《农政全书》成书之社会环境[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55-57.
- [4] 袁定坤.明清科技图书编撰出版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9.
- [5] 莫鹏燕.中国古代农书编辑实践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6.
- [6] 姜吉林.徐光启与《农政全书》的编辑[J].兰台世界,2010(15):26.
- [7] 程先强.徐光启思想研究综述[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2010(4):90-95.
- [8] 查继佐.罪惟录·经济诸臣列传·徐光启传[M].上海:涵芬楼,1936.
- [9] 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农本·诸家杂论(上)[M].中国台北: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
- [10] 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农本·经史典故[M].中国台北: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
- [11] 孔颖达正义,王弼,韩康伯注.周易正义·系辞上,见《十三经注疏》(上)[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81.
- [12] 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蚕桑广类·木棉[M].中国台北: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
- [13] 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蚕桑广类·麻[M].中国台北: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
- [14] 管仲撰,刘向辑.二十二子·管子卷十四·四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5] 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农本[M].中国台北: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
- [16] 徐光启撰,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树艺[M].中国台北: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
- [17] 孔颖达疏.周礼·天官冢宰·太宰,见《十三经注疏》(上)[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647.
- [18] 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 [19] 钱穆.国史大纲[M].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责任编辑:陈万红)